

中国都市 民俗学

陶思炎 等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东南大学科技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都市民俗学



ZHONGGUO DUSHI MINSUXUE

陶思炎等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都市民俗学/陶思炎等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81089-741-1

I. 中... II. 陶... III. 城市—民俗学—研究—中国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3729 号

中国都市民俗学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编:210096)
出 版 人 宋增民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兴化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 东大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向发行部调换,电话:(025)83795801。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	(1)
(一) 变迁的原因	(1)
(二) 变迁的标志	(1)
(三) 变迁的前景与新理论的提出	(5)
二、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	(6)
(一) 民俗分野的空间观	(6)
(二) 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的差异	(7)
(三) 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的整合	(10)
三、都市民俗学建设	(13)
(一) 急迫的任务	(13)
(二) 都市民俗学的体系	(14)
四、都市民俗资源保护	(16)
(一) 资源类型	(16)
(二) 保护方略	(18)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都市民俗	(20)
一、中国古代都市民俗的起源、发展	(20)
(一) 中国都市民俗的起源	(20)
(二) 汉代都市民俗	(22)
(三) 魏晋南北朝都市民俗	(26)
二、唐代都市民俗	(27)
(一) 唐都长安	(27)
(二) 节日庆典	(30)
三、宋代都市民俗	(32)
(一) 北宋汴京民俗	(33)
(二) 南宋临安民俗	(38)
四、元明清都市民俗	(40)
(一) 帝都风俗	(40)
(二) 明清南方城市风俗	(46)
第三章 中国都市民俗文献研读	(49)
一、汉家陵阙西风里——刘歆的《西京杂记》	(49)

(一) 节日风习	(50)
(二) 民间禁忌	(51)
(三) 瑞应感应	(52)
(四) 其他风俗	(53)
二、大唐气象夕照中——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	(54)
(一) 珍奇异物	(54)
(二) 人物遗事	(56)
(三) 风俗习尚	(58)
三、东京乐事如梦华——孟元老's《东京梦华录》	(62)
(一) 京城街巷	(64)
(二) 宫廷典礼	(67)
(三) 里巷风俗	(67)
(四) 节日风物	(70)
四、一枕黄粱梦已觉——吴自牧的《梦粱录》	(73)
(一) 节序风俗	(74)
(二) 山川公府	(78)
(三) 市肆民俗	(81)
五、武林繁华成旧事——周密的《武林旧事》	(84)
(一) 都城临安	(85)
(二) 典章制度	(86)
(三) 市民风习	(86)
(四) 岁时节日	(87)
六、帝京胜景知何多——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	(89)
(一) 岁时	(90)
(二) 酬香	(94)
(三) 熙游	(95)
(四) 虫嬉和游戏	(96)
七、五湖烟景纪丽华——袁学澜的《吴郡岁华纪丽》	(98)
(一) 春社祈年	(100)
(二) 夏伏溽暑	(102)
(三) 秋月登高	(104)
(四) 冬至除夕	(105)
八、六朝山水风俗殊——潘宗鼎的《金陵岁时记》	(107)
(一) 年时风俗	(108)
(二) 春秋佳节	(110)

(三) 庙会斋祠	(113)
(四) 应时风物	(114)
第四章 现代都市的职能与地位	(117)
一、城市与政治生活	(117)
(一) 城市的中心地位	(117)
(二) 都市的政治生活	(119)
(三) 政治文化的影响	(120)
二、城市与经济生活	(121)
(一) 城市起源与经济	(121)
(二) 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圈	(122)
(三) 城市经济生活	(124)
三、城市与文化生活	(126)
(一) 城市的文化魅力	(126)
(二) 城市的文化生活	(129)
四、城市与军事战略	(131)
(一) 军事与城市命运	(131)
(二) 城市与军事科技	(135)
五、都市与信息网络	(135)
(一) 城市与信息系统	(135)
(二) 我国城市信息化的发展	(136)
第五章 都市与都市民俗的特征	(140)
一、都市的特征	(140)
(一) 城市的产生	(140)
(二) 城市的定义	(141)
(三) 都市的人口特征	(143)
(四) 都市的政治特征	(145)
(五) 都市的经济特征	(146)
(六) 城市的地理特征	(146)
(七) 城市的社会交往特征	(147)
(八) 都市的文化特征	(148)
二、都市民俗的特征	(149)
(一) 都市民俗的非农性	(149)
(二) 民俗事象的复杂性	(151)
(三) 传统民俗的变迁性	(152)
(四) 都市民俗的易变性与趋新性	(154)

(五) 都市民俗的商业性	(155)
(六) 都市民俗的游乐性	(156)
三、都市民俗的发展趋势	(158)
(一) 时尚化与传统民俗的相互转化	(158)
(二) 都市民俗与乡村民俗的再融合	(158)
(三) 地域性与民族性的重组与再现	(160)
第六章 当代都市民俗的演进	(162)
一、民间礼俗的变迁	(162)
(一) 婚嫁礼俗	(162)
(二) 丧葬墓制	(163)
(三) 其他礼俗	(165)
二、岁时民俗的消长	(167)
(一) 年节事象的兴替	(167)
(二) 洋节风俗的化入	(170)
(三) 新兴会节的繁盛	(172)
三、游乐方式的更新	(173)
(一) 休闲空间的拓展	(173)
(二) 夜生活的繁闹	(174)
(三) 旅游热的升温	(176)
(四) 游乐向市场的延伸	(177)
(五) 玩具与游戏方式的变更	(178)
第七章 都市民俗探论	(180)
一、都市民俗对象论	(180)
(一) 市民与居民	(180)
(二) 社区与田野	(182)
二、都市民俗价值论	(184)
(一) 价值类型	(184)
(二) 价值认定	(185)
三、都市民俗应用论	(187)
(一) 应用重点	(188)
(二) 应用领域	(189)
后记	(191)

第一章 绪 论

一、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

民俗作为社会的传承文化,始终处在变迁的过程中。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更新而不断地消长演进,始终适应并引导着人们的生活需要。民俗变迁是民俗功能演进的外化现象,既有具象外显的形态变化,又有抽象潜在的结构调整。民俗生活的“与时俱进”,是一复杂的文化过程,把握当代民俗的变迁规律,并加以理论的阐发,不仅是学科发展的任务,也是社会实践的要求。

(一) 变迁的原因

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祖国山河日新月异。伴随着这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我国当代的民俗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城市民俗的比重逐步加大,民俗作为资源走向了市场,民俗旧死新生的汰选速率加大,民俗应用的领域拓宽,民俗教育开始起步,民俗保护意识增强,对外来民俗的融摄力加大,民间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等等。

其变迁之因,是多因素的合力作用,涉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思想解放、城市发展、科技进步、人口流动、国际接轨、教育普及、交通便捷、通讯发达等。由于民俗借助传承人的习得而承传,因此它在古代与现代、前辈与后辈间的形态不可能始终如一、分毫不差。传承人作为创造、传承、享用民俗事象、物象、意象的主体,总是在其实际生活的时空背景下,对作为客体(对象)的民俗传统做出能动的判别与应用。新时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民俗的传承背景和自然演进的节拍,同时不断改造着传承主体,并以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而使他们成为文化新人。这样,主体与客体的各自变化及其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引发民俗生活的变迁。

民俗变迁是一个由外部因素带动内部因素,进而双向互动,从而改变原有文化逻辑的过程,它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整体的运动。因此,对民俗变迁的识解,应建立在对其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同一考察之上,以发现它们相联互动的秘密,找到社会发展与功能演进交相呼应的结合点。

(二) 变迁的标志

民俗变迁的标志可从外在形态的变化、内在功能的转移等方面去寻得。就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而言,可以从“主体空间的流动”、“民俗事象的更新”和“生活需

要的增长”等方面去加以认识。

1. 主体空间的流动

“主体空间的流动”，指主体原来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被打破，进入一个彼此相联、上下流动的开放空间。其主要潮流是从农村流向都市，也包括其他人流群体的定向与多向的运动，它们包括打工群（弃农从工者）、商务群（外出经商者）、学生群（外出求学者）、海归群（归来的海外学子）、游客群（旅游观光者）等。

就民俗变迁而言，人口迁徙、民工大潮、旅游观光是主体空间流动的主要动因。三峡地区、西部沙漠化地区人口的整体远距离迁徙，必将使他们原有的民俗生活发生转变，以适应新的生存空间。民工大潮年年涌涨，民工数达几亿人之巨，他们基本上都是中青年农民，尤其以青年农民为主；他们的流动一方面改变了农业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例，另一方面在乡村民俗的传承方面势必会产生某些断环，同时又将部分乡村习俗带入都市，与都市民俗不断磨合。旅游业的兴盛，几个“黄金周”的出现，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游客大军，也推进了民俗的变迁发展。庙会的恢复，人造会节的兴办，借用异地异族风物建造的民族园、民俗村，各地民间艺术类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互市等，也都从空间的流动方面显示了民俗的变迁。

民俗变迁的过程所揭示的民俗演进的特征是：从地域性到广域性，从因袭性到时尚性，从单一性到复合性。

所谓“从地域性到广域性”，即随着空间的流动，民俗的地方性逐步减弱，而多地域的综合性则逐步显现出来；所谓“从因袭性到时尚性”，即因袭传统的民俗因素减少，而带有潮流性、时尚性的民间风习正迅速传播；所谓“从单一性到复合性”，即源于农耕社会的，或某一时某一地的民俗，在现代和后现代工业社会，会因地域交通、民族融合、国际交流等因素而出现复合性状态。主体空间的流动，推动着民俗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

2. 民俗事象的更新

“民俗事象的更新”，作为外显的形态变化，是最易使人感知民俗变迁的符号群。就当代民俗生活而言，在岁时民俗、人生礼俗、饮食起居、交际游乐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显著的变化，体现着民俗的演进发展。

就岁时民俗说，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正经历着一些变化：合家欢聚的年夜饭前不再有闭门、封井、烧糝盆、祭祖先一类的习俗，吃年夜饭的空间场所也不完全拘于家中，在都市里已有相当多的家庭选择到宾馆、饭店去吃年夜饭；除夕的主题不再是燃烛守夜，看电视成了主要的助兴活动；拜年的方式更趋多样化，并借助现代通讯手段，电话拜年、“伊妹儿”拜年、手机与寻呼机短信息拜年等越来越普遍；春节不再困守家中，举家出游，去外地甚至到国外已渐成风气，春节由“过年”已渐变为“度假”；穿新衣、吃荤腥不再是“肥年”的标志，人们已无法以物质消费区分“过年”与平素的不同，文化消费与精神追求成为最令人关注的目标；过年为“度阴”的信仰观念已经

消逝,神秘的禁忌大多也已淡化,人们喜爱吉祥的象征文化,以春联、年画、花灯、窗花、中国结等民艺物品装点春光融融的新年景象,青少年的“压岁钱”不再用于放鞭炮、买玩具、吃零食,而主要用于逛书店、进网吧、订报刊等文化消费上……

就婚俗来说,当今的婚礼形式出现了不少变化,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婚礼形式包括:自宅式、宴会式、旅行式、茶话式、自娱式、集体式、野炊式、植树式、神前式、祭灵式、领证式、宣誓式、运动式等等。

“自宅式”,即在自家宅内操办的婚礼,这在广大乡村仍在传习。“宴会式”,即到宾馆、饭店举办婚宴酬宾。“旅行式”,即一对新人以外出旅行取代婚礼的其他仪式。“茶话式”,即不办酒宴,来宾边饮茶水,边对新人说些祝贺与勉励的话语。“自娱式”,指一对新人约来各自的同学、同事、朋友,以歌舞、游戏作为自己的婚礼形式。“集体式”,指在纪念性节日,在广场、体育馆等公共空间,由某官方社团组织的多对新人的结婚仪式,以倡导新事新办。“野炊式”,指不搞宴会,新人约上青年朋友们,到山中或水边去,以自炊或携带酒食的野餐方式作为婚礼的庆宴。“植树式”,指结婚那天,新人们到郊外种上一棵纪念树,以绿化祖国的具体行动将自己与自然、社会联结在一起。“神前式”,即新郎穿西服、结领带,新娘披上白色婚纱,在基督教堂内举行婚礼。“祭灵式”,即新人们到烈士陵园或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束,以缅怀为今天的幸福而不惜牺牲的英雄们。“领证式”,即一对新人双双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并站在用国徽、国旗、鲜花、红地毯装饰的颁证台上,回答登记员的有关问题后,在证书上签字、按手印,从而成为合法夫妻^①。“宣誓式”,指在上海、无锡已先行推出的,民政部参照国外的类似做法正拟采用的一种结婚登记方式,它以宣誓声明来表达夫妻间庄严的承诺^②。“运动式”,指新人参加某些特殊的体育活动或惊险项目作为婚礼的仪式,如跳伞、乘飞机遨游江山或穿越山洞、乘潜水艇入海等。以上诸方式大多反映着当今婚俗事象的变迁走向。

就丧葬民俗而言,其形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入土为安”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改变。在都市已废除了木葬,代之以不占土地或少占土地的新的葬法。例如,以层叠的方式寄存骨灰盒的壁陵、塔陵,已在镇江、苏州、南京等地出现,上海有骨灰抛撒大海的“海葬”葬式,而南京有骨灰抛撒扬子江的“江葬”活动^③。此外,把骨灰埋于树下的“树葬”已受到倡导,而将骨灰送到外层空间的“太空葬”在香港也已开始策划。

在交际礼俗方面,贺寿以拍贺电、送鲜花、送蛋糕取代了送寿联寿幛、寿面寿桃之礼,人际交往也逐步地走向了时尚化。在居住方面,四合院式的大杂院已基本不存在,民居正向楼群化、小区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家族关系和狭义的邻居关系将

① 见1998年11月10日《扬子晚报》。

② 见《扬子晚报》2002年1月13日,B1版。

③ 陶思炎:《中国都市的墓制走向》,载《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被小区文化所培育出的新型公共关系所取代,并体现出民俗事象更新的成果。

3. 生活需要的增长

民俗事象形态与内涵的演变,实际上是功能转化的结果,也是在适应主体需要的前提下做出的文化调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①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决定着礼俗的功能,也决定着礼俗的形态。其实,早在两千年前,中国的荀子已看到需要与礼俗的直接关系,他说:“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②荀子当年虽没说出“需要”、“功能”一类的语词,但却表达出礼俗与人的需求间的派生关系。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时,又促使新的需要产生,反映在民俗生活中亦是如此。对民俗来说,这种需要主要反映为两种意识的增强,即民俗资源意识和民俗保护意识。

“民俗资源意识”是当代人对传统文化认识与回味的需要和第三产业开发的需要的体现。这一意识在旅游市场、民艺产业、收藏市场等领域已进入应用实践阶段。各地民俗博物馆的开办、民俗街的开发、民俗会节的组织等,都是从不同方面对民俗资源的开掘。拿南京近郊来说,江心洲民俗街以农趣馆、茶艺馆、婚俗馆、大作坊等,形成一串各有主题、各具特色的农家民俗馆,并连点成线,形成乡土文化的游览区。此外,高淳县利用久负盛名的“一字街”,新辟画像砖博物馆、道画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以古建筑、民俗实物、拓片、照片等展示当地厚重的民俗资源,并在民俗、艺术、宗教的结合上显示出地方的特色。南京郊区和郊县在民俗旅游开发方面的努力,虽还有待于完善和加强,但体现了资源意识的更新。

“民俗保护意识”是针对社会变革中一些民俗文化正因主客观因素的作用而迅速走向衰亡的现象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它尤其警惕对民俗文化的人为毁损,从维护民族与地方文化生态的立场出发,强调对民俗传统的理解与珍视。例如,近十年来城市改造的速度加快,成片的老式民宅被拆毁,代之以幢幢新楼,其中不少有纪念价值、艺术价值、研究价值、文物价值的旧宅一毁而尽。于是,民俗保护意识随之而生。扬州在拆除赞化宫等处的民居时、徐州在拆除户部山民居时,均有有识之士出面力拒、上书呼吁,表现出爱乡爱土的主人公意识与民俗保护意识。民俗保护在当前正从原先的抗议或呼吁逐步走向开发、抢救和立法,实现着从保护的意识向保护的行动的积极转变。

①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 页。

② 见《荀子·礼论》。

(三) 变迁的前景与新理论的提出

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正使民俗传演中心发生着转移,其前景必然是由农村转向都市。都市是政治、经济、交通、通讯、文化、教育等的中心,也将是民俗生活的中心。古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曾使古代都市民俗走向辉煌,从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及周密的《武林旧事》等著述和《清明上河图》等画卷中,我们可看到中古时期都市民俗的繁盛图景。民俗中心从农村向都市的转移是一个虽有起伏,但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当今的中国加快了其演进节奏。

随着现代大都市的发展,以及都市圈的形成和农村城镇化的加快,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总体而言,农业型社会已面临弱化,而城市型社会正在走强。就民俗而言,乡村的农业民俗在全社会的比重下降,而城市的非农民俗的比重越来越大。具体说,表现城市生活的经济民俗、社交民俗、游乐民俗、人生礼俗、消费民俗等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而表现农业社会的岁时民俗、伦理民俗、生产民俗、信仰民俗、丧葬民俗等逐步走弱。就城市、乡村这传统的两大生存空间而论,民俗中心在我国正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其结果是城市生活必将成为我国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

民俗变迁的前景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与主体的从业情况及空间分布密切相关,与客体的变化互联互动。民俗变迁既是民俗文化的研究领域,也是社会研究、城市研究的新课题,它需要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从当今民俗变迁的实际出发,应当提出并应用以下三个新的理论以发展中国民俗学,即“主体与时空流动论”、“民俗中心转移论”和“传统与现代磨合论”。

“主体与时空流动论”,着眼于民俗主体与民俗客体的各自变化及相互关系,研究其内在的互动与制约机制,探讨其单方与双方对变迁的影响。这一理论把主体与对象放在“流动”的框架内,不作平面的静态分析,而在双向或多向的动态背景下,追踪民俗变迁的轨迹和其运动规律,从流动的现象进入变迁的本质。

“民俗中心转移论”,作为民俗变迁的方向性研究,着重从总体、全局进行分析、判断,把握中心及中心的转移。它既注意民俗运动的一般规律,又注意某些阶段性的突变因素,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抓住中心的所在及其位移趋向。这一理论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为社会控制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与城市建设、文化开发与文化保护等都能提供重要的参考。“民俗中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其判别标准需要理论的概括,其位移判断需要有指标体系的依据。

“传统与现代磨合论”,立足于随外在民俗事象的演变,内在民俗精神延续与发展的事实。它把过去与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与新生看作既相分离,又相联结的整体,注意后者对前者的取舍与创新。民俗变迁不是“民俗革命”,外显符号的变化往往是内在精神磨合的结果,即便是作为“舶来品”的洋风俗,如洋节日、洋礼俗等,

也都经历了接受与改造的潜在过程,而融入国人的当代生活之中。这一理论旨在辩证地看待从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等因素的互容性,使变迁有迹可寻,并能加以预测,从而为文化创新的实践提供思路。

我们认为,上述三理论不仅有助于民俗变迁的研究,也有助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其体系的完善与应用,在当今已成为一项有意义的任务。

二、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

“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是两个彼此分离又相联系的文化范畴,它们各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既有异动,又有整合。在当代,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的互动关系更加突出,它们或呼应,或互补,整体地展现着现代社会的民俗风貌。

(一) 民俗分野的空间观

以地理观念,或者说以空间观念划分民俗的类型是自古以来最常见的民俗认知方式。《汉书·王吉传》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以及后人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言,都是从空间的视角对民俗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加以概括。古人以“水土”、“天气”、“地形”、“水泉”、“草木”等地理因素作为风俗判别的坐标,正是空间观的表达。《汉书·地理志》曰: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这里,班固将“风”说成是“水土”所系,强调地理环境(空间因素)对人的性格、语言、风气的决定作用。此外,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指出: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

应劭的风俗说也强调空间的因素,把“风”说成是由“天气”、“地形”、“水泉”、“草木”等地理条件所制约的。

对民俗文化作空间划分有着多重的视角:

从地形、地貌着眼,可分成“山地民俗”、“湖区民俗”、“平原民俗”、“草原民俗”、“海岛民俗”、“河川民俗”,等等。

从地理方位着眼,可分成“北方民俗”、“南方民俗”、“东北民俗”、“西南民俗”、“西北民俗”、“东南民俗”、“中原民俗”,等等。

从行政区划着眼,则民俗文化又可分作“北京民俗”、“上海民俗”、“江苏民俗”、“广东民俗”、“西藏民俗”、“内蒙民俗”、“香港民俗”,等等。

从行业着眼,以经济地理的视角,民俗文化则又可分成“农耕民俗”、“畜牧民

俗”、“蚕桑民俗”、“山猎民俗”、“渔捞民俗”、“盐业民俗”等多种类型。

从人口聚居地着眼,空间性民俗文化又可分作“乡村民俗”、“市镇民俗”、“都市民俗”等基本类型。其中,“市镇”概念既包括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居的乡镇,也包括基本为非农业人口的小城市。至于“乡村”,则空间辽阔,人口分散;而“都市”,多指人口密集、百业荟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由于都市化是现代化的直接结果,因此,侧重都市民俗的研究与构建、完善它的理论,在当今具有学术的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二) 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的差异

“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同作为地理性的文化概念,是相互对照又彼此混融的有机整体。不过,由于经济活动、人口因素、信息交换、功能取向等方面的影响,它们的类型构成、文化背景和传承手段等都展露出明显的差异。

1. 类型构成的差异

乡村是传统的第一产业的主要基地,其社会生活长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制约。“乡村民俗”作为一个笼统的、集合的概念,因劳动对象与劳动空间的不同而形态多样,各具其趣。在以稻麦种植、蚕桑生产、猪羊圈养等为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依赖血缘联系、情牵大田作业、关注岁时节令的“农村民俗”;在以牧马放羊、喂牛挤奶、割草搭棚为主的畜牧村落,形成了驰骋草原、纵情放歌、奶茶飘香的“牧村民俗”;在以上山砍柴、打猎采药、开山取石为业的山乡村落,形成了叠石为房、柴薪为门、野味满屋的“山村民俗”;在以摇橹扬帆、结网修船、捕鱼养殖为主的渔民村落,形成了临水而居或以船为家、渔汛庆典、捕捞禁忌、渔歌渔鼓等“渔村民俗”。

“农村”、“牧村”、“山村”和“渔村”,是行业性与地理性自然村落的不同名称,其坐落位置、经济手段、劳动群体和劳作规律派生出各有个性、风格迥异的民间风俗,从而形成了乡村民俗的不同类型。

城市是以城池、街市为标志的人口聚集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军事的中心,而现代都市又可能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交通枢纽和旅游基地。城市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过去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谋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的纷呈的特征。就城市整体的功能而言,各城市因其文化功能的相异而分属于不同的类型。在宫廷、府治所在的古都型政治城市,形成了效仿上层社会,重礼仪、讲门第、求精细,傲然与顺从交并的“都城民俗”。在工商型经济城市,形成了码头繁闹、会馆连云、商号林立、旗幌飘摇的“商埠

民俗”。在衣食车骑、游乐赏玩、安然度日的休闲型消费城市,形成了以酒楼歌馆、戏院澡堂、书肆园林、画舫轿马等为标志的贵族化“市民风俗”。在屯田驻兵、金戈铁马、狼烟时起的边关型军事城镇,形成了修城筑台、亦兵亦农、戍边驻边、爱家爱国的“军城风俗”。

除了“都城”、“商城”、“军城”、“民城”,还有“山城”、“水城”、“泉城”、“雪城”、“石头城”等,以及“边贸城”、“汽车城”、“化工城”、“石油城”之类的现代新城。它们同时具有非农业的共性,但彼此民俗却不尽相同,其类型构成与乡村民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

2. 文化背景的差异

首先,乡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乡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则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工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因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

其次,乡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乡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市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

再次,乡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乡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乡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词语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

最后,乡村与城市的娱乐方式不同。乡村中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活动比较活跃,山歌、谣谚、传说、故事等仍在乡民间口耳相传,民间舞蹈、民间小戏、锣鼓杂耍等仍在民俗节日、庙会期间、丰收之后或其他乡间的重要庆典上作自娱性的表演,此外,傩戏、傩舞、唱麒麟、唱凤凰等带有巫风色彩的艺术活动,在贵州、江苏、安徽等地的一些乡野至今犹见。城市中的民间文学体裁以笑话、新故事和政治讽谣居多,秧歌、扇舞等民间舞蹈转化成晨练性体育活动,歌厅、舞厅、酒吧、茶馆、网吧、健

身房、游泳馆、棋牌室、步行街、休闲广场等成了市民的娱乐空间。都市的娱乐圈相对开放,没有家族、社区、行业、性别等的明显区分,相对乡村来说,城市中的社交与娱乐有着更多的选择。

3. 传承手段的差异

民俗作为文化传统是通过传承而自然延续的,其传承手段因方式、载体、媒介等不同而各具特征。就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而言,直接习得与间接习得、农事载体与非农载体、人际网络与信息网络,构成了它们传承手段的主要特征。

“直接习得与间接习得”,着眼于传承的参与方式,它从主体地位出发,考察主体与客体间相互关系的动态过程。

所谓“直接习得”,是让承传者以亲历、体验、参与的方式,在具体、真实的民俗情境中通过观察、跟随、操作而接受民俗熏陶,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各种民间知识,把上辈的群体的文化传统转化为个人的习惯。“直接习得”是乡村民俗传承的主要手段。例如,在祠堂里举行的宗法性庙祭仪式,在丘墓前进行的岁时性墓祭活动,以及在家室中进行的常循性家祭风俗,乡村的承传者因从小置身其中,不断参与,反复感受,在亲历中将自身融入了风俗传统,并能将这一传统传给后辈。

所谓“间接习得”,指承传者不必亲身参与各类具体的民俗活动,不必处处置身真实的民俗环境之中,而是通过事象见闻、空间模拟等方式感知民俗规律,掌握相关知识,并能传感他人。“间接习得”是当代都市民俗传承的重要手段。例如,端午节市民不必去野外采菰叶、菖蒲、艾草,可从邻家的门头上见到菖蒲之类的装饰,不必动手包粽子,可从市场或商店购得,从而感受到节日气息。再例如,近来一些茶馆、饭店刻意营造乡土民俗的氛围,以木版年画、春联、窗花、水车、石磨、油灯、草鞋、斗笠、蓑衣、瓜果、农具、草檐、窗轩、板门、布帘、石径等为装饰,这虽属片面性模拟再现,但为年轻的市民开辟了间接习得的传承空间。

“农事载体与非农载体”,着眼于传承载体的领域构成,它从立体的活动空间出发,考察行业特征带来的生活方式、精神观念、社会组织等不同,及其对民俗传承的影响。

所谓“农事载体”,即以各类农事活动为民俗传承的载体,其自然经济的性质决定了相关的民俗生活,成为乡村民俗传承的主要凭依。例如,山歌农谚、秧歌号子、水旱占验、土地庙祀、农桑禁忌、春耕仪式、村落格局、中堂布置、联宗祭祖、田间小戏、傩仪傩舞、唱春哭嫁等,都承载着乡村的民俗信息,并借农事性物象、事象、语象和心象而延续传统。农事载体的突出标志是具有土地化的行业特征,并由此显露乡村生活的风韵。乡民正是借助“农事载体”,不断强化乡土意识和增进村田知识,满足了对乡俗接受与传承的需要。

所谓“非农载体”,即以农事活动之外的各种行业活动和经济方式为载体,市镇居民在从事工业、商业、手工行当及其他服务业中接受和延续风俗传统,包括行业

生产的传统、城市生活习惯、市民意识、社区组织、行会组织、节日与休假方式、交通工具、交际活动、消费观念、旅游需求等。非农载体的主要标志,除了非土地化的行业特征,在形态上还具有多元、混合、开放的性质,它与市镇生活,尤其是与都市生活相适应。市民通过“非农载体”,对都市生活加以认同、习得,并能以己身为媒介向城镇新移民播化。

“人际网络与信息网络”,着眼于传承的联结因素,它从主客体的各种有形与无形联系的线索出发,考察媒介应用给社会习俗带来的各种影响。

所谓“人际网络”,系指由血缘、地缘、业缘、神缘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乡村中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村民、乡民传承民俗文化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确立自我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原点。“人际网络”服务于信息传递,这种传递长期以来主要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和行为体态来完成的,传递的过程既是亲历与习染的过程,也是交流与承传的过程。在乡村中,乡民对民间知识的取得主要靠直接的人际间的传感,而较少依赖其他的媒介。他们的联系网络往往带有浓郁的乡情和亲和的魅力。

所谓“信息网络”,系指由电话、电报、电视、广播、传真、电脑、卫星等电气与航天成果构成的现代信息系统,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建立和普及,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快捷而间接。现在,消息的传递、文化的传播不再依赖以口耳相传为特征的亲历和亲闻,透过虚拟的网络世界也能得到真实的生活信息。与乡村民俗的传承手段相比,城市民俗的传承媒介更新更快,“人际网络”正被“信息网络”所取代。在都市,人们相互间的联系除了亲情的凝聚,更有媒体、媒介的催化,人们在信息网络中共享民俗与文化的资源。就传承的联结因素而言,乡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传承手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过,这一差异是阶段性的现象,它必将随着乡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互动及城乡经济的充分发展而逐步缩小。

(三) 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的整合

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久、深入,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的互动整合加快,出现了不少亟待从理论上加以廓清的问题。

1. 必然过程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昔日作为穷乡僻壤的辽阔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修到了村口,草房变成了楼房,家电进入了农家,电话和移动电话也成了农民手中的常用工具,摩托车和小汽车开进了农家的院门,农村的商品市场早已星罗棋布,出省旅游和出境旅游构成了富裕农民的新消费,乡村的物产资源、生态资源、人文历史资源、民俗民艺资源开始受到了重视与利用,科技知识和科技成果在